

西江流域东周时期墓葬的 青铜文化内涵与特征

刘中伟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Abstract: Lingnan Bronze culture in Eastern Zhou Period remains mainly in West River areas. The bronze culture features such three aspects as the combination and placement of weapons and tools, localization of the casting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diversity of the bronze ware group. The natives, once aboriginal people like Nanyue in Warring State Period, Qin Dynasty and Han Dynasty, are the major creator of these culture.

Key words: West River; Eastern Zhou Period; Bronze culture; Nanyue

摘 要: 西江流域是岭南东周时期青铜文化遗存较集中的地区, 青铜器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兵器 and 工具的组合及摆放位置、本地化的铸造技术、器物群的多种文化因素组合三个方面。当地的土著居民应该是这些文化的主体创造者, 他们就是战国秦汉时期的“南越”等土著民族。

关键词: 西江流域; 东周; 青铜文化; 南越

西江流域北起广西梧州, 南至广东三水, 包括广东西北部的大部分地区, 是岭南东周时期青铜文化遗存较集中的地区, 主要发现有德庆落雁山^①、四会鸟旦山^②、四会高地园和怀集拦马山^③、广宁铜鼓岗^④、罗定南门垌^⑤、罗定背夫山^⑥、封开利羊墩^⑦、广宁龙嘴岗^⑧等^⑨9处78座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墓葬。它们较密集地分布于西江及其支流^⑩两岸的山丘高地上, 青铜器是墓葬中的主要随葬品, 共827件, 占全部随葬品的81.6%, 有兵器、工具、生活用具、乐器等类别。兵器类有剑、短剑、矛、镞、戈、钺、镢、鐙等, 工具类有篋刀、斧、削、凿、锯、锄、锛、镰等, 生活用具有鼎、盃、缶、盘、鉴, 乐器有甬钟、钲等, 其他有少量人首柱形器、铜镇等杂器。青铜器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兵器和工具的组合及摆放位置、铸造技术、器物群的多种文化因素组合三个方面。本文对这些文化内涵和器物特征进行初步分析和总结, 并探讨其周邻关系。

一、组合及摆放位置

青铜器组合可以分为兵器、工具和杂器三

类, 兵器类常见剑(短剑)、矛、镞, 工具类常见篋刀、斧、削和凿, 均伴以砺石出土。

岭南土著有着自己独特的武器类别。《临海水土异物志》载“其地亦出铜铁, 唯用鹿觥, 为矛以战斗耳。磨砺青石以作矢镞刀斧”, 说明土著用石质材料制作矛、镞、剑、斧等工具的传统和相对落后的社会面貌。《汉书·高帝纪》:“越人之俗, 好相攻击”, 《汉书·地理志》:“吴越之君皆好勇, 故其民至今好剑, 轻死易发。”说明越人有尚武好斗的习俗, 这就自然提升了对武器的需求和珍爱。以刀、剑、矛、镞、斧(钺)等为组合的武器在墓葬中多出土于墓室的中部, 刃部多有残损和磨砺的痕迹, 说明墓主生前对这些器物的重视和曾经的广泛使用。

博罗横岭山是岭南商周时期的一处长期延续使用的墓地, 郭立新通过对该墓地随葬品的数量、材质和功能等进行分析后认为, 该墓地所反映的岭南商周时期社会人员构成“社会身份异常发达, 性别是该社会最重要的组织原则, 劳动分工亦具有深厚的性别基础”, 具体说就是男性墓葬均出土铜兵器和砺石, 女性墓葬均出土纺轮^⑪。这种身份标识的差别在西江流域东周青

铜墓葬中依然十分明显,龙嘴岗、铜鼓岗墓地中随葬兵器的墓葬均不见有纺轮出土,发掘者推测墓葬的主人属古越族,死者均为男性,随葬工具和兵器说明他们并未完全脱离劳动,在战争和械斗中充当武士。这种身份标识的长期稳固存在可能已经形成了岭南越人特有的一种埋葬习俗。

墓室常见四角放置人首柱形器的做法,尤以较大墓葬最为明显。一般的情况是4件人首柱形器分立墓室四角,人首面朝坑外或面面相背,较完备者如背夫山、鸟旦山、南门垌 M1、怀集拦马山墓葬,高地园 M1 出土 2 件。据蒋廷瑜考证为棺架立柱顶部装饰,应为原棺架腐朽后落于墓室四角地面之中,至今在广西北部山区南丹县“白裤瑶”的岩洞葬棺架上尚可见到形制一致或近似者^⑫。

二、本地化的铸造技术

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的岭南地区青铜器铸造技术显示出诸多本地化的特征。孙淑云对大梅沙墓葬出土的青铜箴刀和矛进行扫描电镜能谱分析后认为,该地青铜器组织中含有白铋(Bi)亮晶细块和较多砷(As)元素成分,“形制、成分及制作工艺既有内地文化的因素,又具有地方的特色,可认为是吸取了内地青铜技术,在材料上则利用了地区性的矿产资源,是在当地制作的”^⑬。杨耀林对深圳及邻近地区青铜器铸造技术、工艺和金相分析后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并认为地方特色表现在石范和合金成分具有地方性、铸造技术具有一定的原始性等方面^⑭。出土的甬钟等乐器,虽然具备了类似中原地区“礼器”的外在形制特征,但研究表明它们实际上并不具备乐器的音律功能^⑮,是本地铸造的产物。这都

说明岭南地区先秦时代青铜器铸造在技术上表现出的本地特征和土著特色。

三、多种文化因素组合的器物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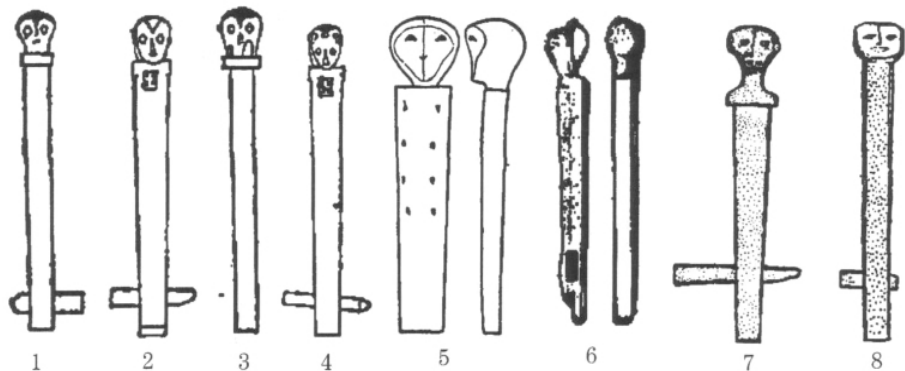
青铜器的形制和纹饰体现出多种文化因素的组合,具体可以分为土著文化因素、商周时期中原地区文化因素、吴越地区文化因素、两湖楚文化因素和战国时期云贵地区滇文化因素等五类。

(一) 本地土著文化因素

该类器物的形制或纹饰仅见于岭南地区,或者在早期本地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主要有人首柱形器、斧钺、箴刀以及矛等兵器和工具上的“王”形、“門”形符号等装饰。

人首柱形器 又称人首杖头饰、柱形器、铜柱等。器形大多类似,分人首和器体两段。上部人首形象一般是宽额尖颌,两眼眶深陷,自额中部一条竖线直达嘴部表示出鼻子的轮廓。下段多呈长条柱形,上粗下细,底端侧面常见四方形穿孔,内插长条形楔子,柱体或有“王”字形符号。(图一) 此类器物原用途不明,近来蒋廷瑜认定为棺架立柱上的装饰。广西南丹岩洞葬棺架立柱的顶部至今仍常见牛角形、人头形装饰,直接在棺架立柱的上端用刀斧砍削而成或单独制作后装于木柱之上,数量从1个到4个不等,形状也无定制,人头形的多削出眼、鼻、口等器官和发髻,颈下部削成锥形以便于安插^⑯。底端的楔子应该是为该器物在棺架顶部保持同一高度不至于嵌入太深而专门设置的。

矛 在两广先秦墓葬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当时成年男性墓必备的随葬品,也是成年男性随身必备的防卫武器^⑰。矛长身,宽叶,脊棱凸出,或有方形钮。脊的两边有斜角云雷纹、窃曲纹图



图一 青铜人首柱形器

(1~4. 背夫山 5~6. 高地园山 7. 鸟旦山 8. 南门垌)

案。骹口平直或弧形，圆釜内留有木柄痕迹。除这种长身、宽叶的矛仅见于西江流域青铜墓葬以外，其他的矛叶釜正面中间的直钮、云雷纹、铸有“門”形或“王”形符号均为中原、楚地所不见，表现出浓厚的土著文化特征。（图二）

斧钺 墓葬中见到数量最多的随葬品之一。两者形制相近，史籍中也经常斧钺并称，以较宽、有肩者为钺，以细长、无肩或微肩者为斧。它们形制虽有一定差别，但是锋利的刃部和釜部都有磨损和崩口，为实用的生产工具或兵器。钺分三类。第一类梯形铲状，称为梯形钺，直柄下伸至体中部，双折肩，一侧较宽，略不对称。（图三：1~5）又被称为两广类型钺，其出土数量较少，地方特点突出，演化过程比较简单，由当地的有肩斜刃石斧直接演变而来^⑧。第二类钺体较宽，两侧弧形凹入，刃部外凸近扇形（图三：6~9），和本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有肩石斧形制相似^⑨。第三类钺直柄，肩直线折出如扇状，柄两面饰雷纹和锯齿纹。（图三：10~15）这类钺集中发现于广东西部地区，其他地区数量较少，和本地之前流行的梯形石斧和有段石锛有一定渊源^⑩。斧与钺形制相近，应该有同样的传

承关系，器形大小不一，长方釜，釜内大都有木柄残迹，器形由大变小，刃部由弯曲逐渐变直。（图三：16~31）

篋刀 柳叶形，束腰，体较宽，锋为较尖三角形，刃口在两侧，尾端平齐，中脊隆起有棱线，断面呈人字形。部分篋刀上面出现“王”形符号。篋刀尤以小型墓地发现较多，铜鼓岗墓地发现72件，龙嘴岗墓地发现49件，应该是常用的生产工具，也可作武器使用。该器物又称刮刀、刻刀，龙嘴岗和利羊墩发现的有釜篋刀是其最初的形制，形体较短小，有椭圆形釜孔以装柄。（图四：1、2）后釜孔消失，面作平齐式，一端尖锐呈三角形，中脊断面仍为人字形。如背夫山所见铸有细密平行的直线纹，部分后段有绳索捆绑痕迹，柄部安装方法已经演变为捆绑式。（图四：3、8）孙淑云对深圳大梅沙春秋墓葬出土铜篋刀做扫描电镜能谱分析后认为是利用当地的矿物资源在本地制作^⑪，是具有鲜明地方特征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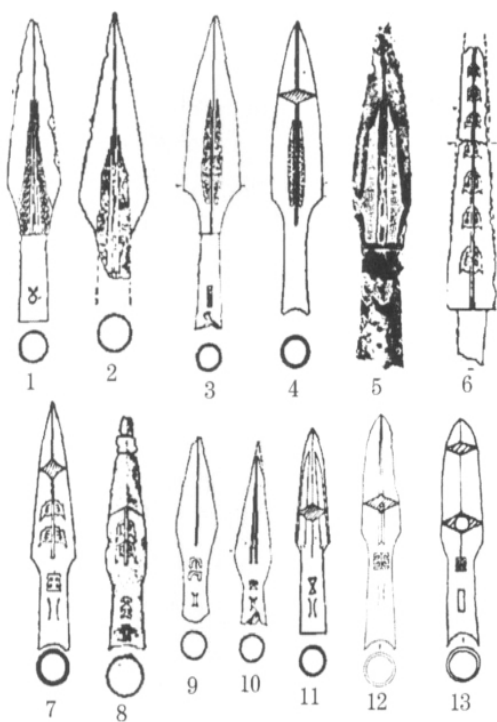
（二）中原地区商周时期文化因素

西江流域发现的该类器物多出土于东周墓葬，器物形制多见于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形制接近，时代相对较晚，说明中原青铜文化很早就对较远周边产生间接而持续的影响。岭南地区虽然地处边远，青铜文化发生较迟，而且经过吴越、楚地的间接传介和改变，但依然可以看到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踪迹。

短剑 扁茎无格，茎上有一圆穿，剑身较短，中部起脊。此类剑脱胎于我国西部和北部的柳叶形剑，东周时期在中原地区流行^⑫。（图五：1~3）

矛 依形制不同可分为两式。Ⅰ式，矛身较短，刺较短窄，骹底边平（图五：4、7、8）；Ⅱ式，矛身较长，刺较宽，骹后弧口。（图五：5、9、10）青铜矛早在商代二里岗期已经出现，战国时期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是青铜矛的中心分布区^⑬，铜鼓岗矛均为中原商周时期常见，Ⅰ式矛为殷商时期的三角形形制，Ⅱ式流行于西周早期。

戈 发现数量较少，共5件。形制基本一致，直内，长援向上昂起，隆脊，前出收杀锐锋，长胡，阑侧有一小圆穿，下为两个或三个方穿。（图五：11~13）戈为勾兵，青铜戈最早发现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商周时期是中原地区



图二 青铜矛

（1~3、6、9、10. 南门垌 4、7、11. 背夫山
5. 铜鼓岗 M22 8. 鸟旦山
12. 龙嘴岗 M8 13. 龙嘴岗 M6）

车战时主要的格斗武器，是兵车的必备武器之一，于商代二里岗期传播至吴城文化并逐步向周边扩散²¹，战国以后车战减少而戈也渐少。

镢 圆釜，筒形，器体中空，底部有因使用而留下的撞击痕迹。(图六：12~15)

鐎 圆柱形，釜端稍粗，大半截中空，内有朽木柄。(图六：16~17)

削 是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出土数量众

多，铜鼓岗和龙嘴岗两处墓地出土达 75 件。一种环首，背部呈弧线；另一种直柄，背部呈直线。(图六：3~6) 削是中原地区较早开始使用的工具之一，最早的见于二里头遗址，商周时期河南、陕西等地大量出土，广为流行，应属于中原文化系统²⁵。

凿 分两种。一种细长楔形，方釜，双面刃；另一种圆柱形或圆形，釜中间稍凸起。(图六：7~11) 凿在中原地区商周时期已经大量出现，主要集中在河南、陕西和山东等地，春秋以后特别是到战国时期流传范围扩大，各地均发现有类似器物²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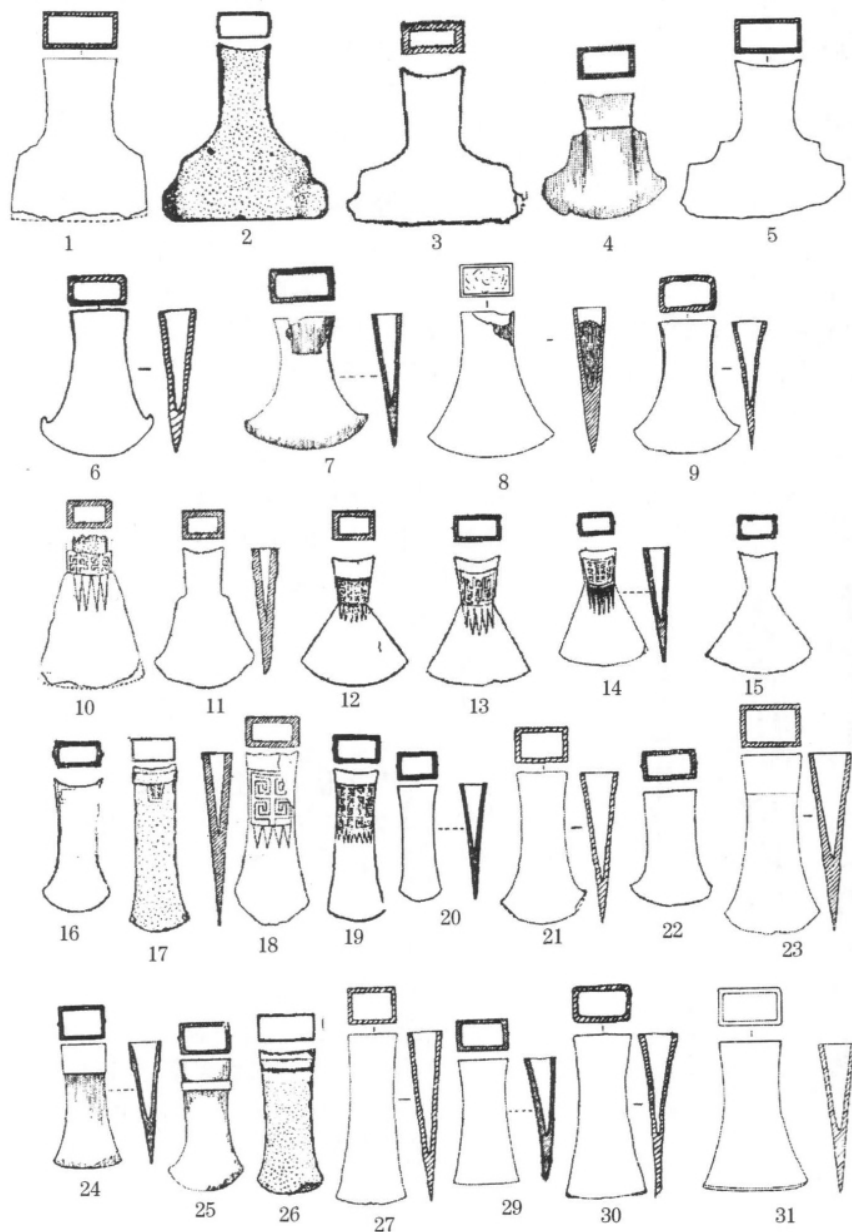
锯 长条形，二等边三角形锯齿。锯身上部装柄，将锯身嵌入柄之凹槽内，只露出宽约 1 厘米左右的刃缘。器身或有不规则的圆孔，用于捆绑木柄。(图六：19) 中原地区商代已出现青铜锯，形制多样，春秋战国之际达到全盛时期，后被铁锯取代²⁷。岭南则延续到南越国时期²⁸。

铎 为军阵乐器，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背夫山、南门垌和鸟旦山墓地各出一件，短甬，中空，两缘下垂，或饰有勾连雷纹。(图六：1—2) 《周礼·夏官·大司马》载：“群司马振铎，车徒皆作”，由此可知铎为中原文化系统器物。

钺 1 件，凹形，上段中空以装柄，下端楔形，平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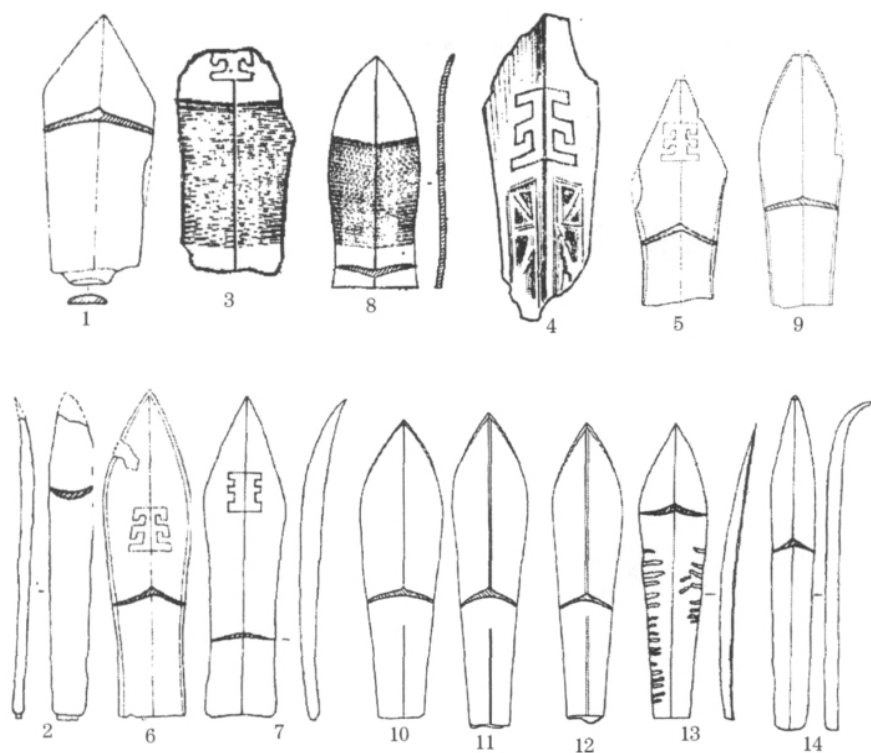
钁 长方形，弧形弯曲呈瓦状。(图六：20)

镰 1 件，呈不规则梯形，一面光平，柄中有



图三 钺和斧

(1、21. 龙嘴岗 M8 2、17、19、26. 鸟旦山 3、10~12、18. 背夫山
4、7、14、24. 铜鼓岗 5. 龙嘴岗 M4 6、9. 龙嘴岗 M5 8. 龙嘴岗 M19
13、15、16. 南门垌 20. 铜鼓岗 M18 22、30. 铜鼓岗 M16 23. 龙嘴岗 M3
25. 铜鼓岗 M21 27~29. 龙嘴岗 M6 31. 龙嘴岗 M18)



图四 箴刀

- (1. 利羊墩 M26 2. 龙嘴岗 M5 3、8. 背夫山 4. 铜鼓岗 M28 5. 利羊墩 M46
6. 利羊墩 M29 7. 龙嘴岗 M11 9. 龙嘴岗 M19 10~12. 龙嘴岗 M16
13. 龙嘴岗 M5 14. 龙嘴岗 M6)

一圆孔，刃缘有细密的锯齿，刃面饰平行细密而凸起的斜线纹。（图六：18）

上述生产工具表明，东周时期岭南农业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

（三）吴越地区文化因素

器形集中发现于吴越地区，岭南地区的该类器出现较晚，应是普遍流行以后传入或本地仿制的，属百越文化系统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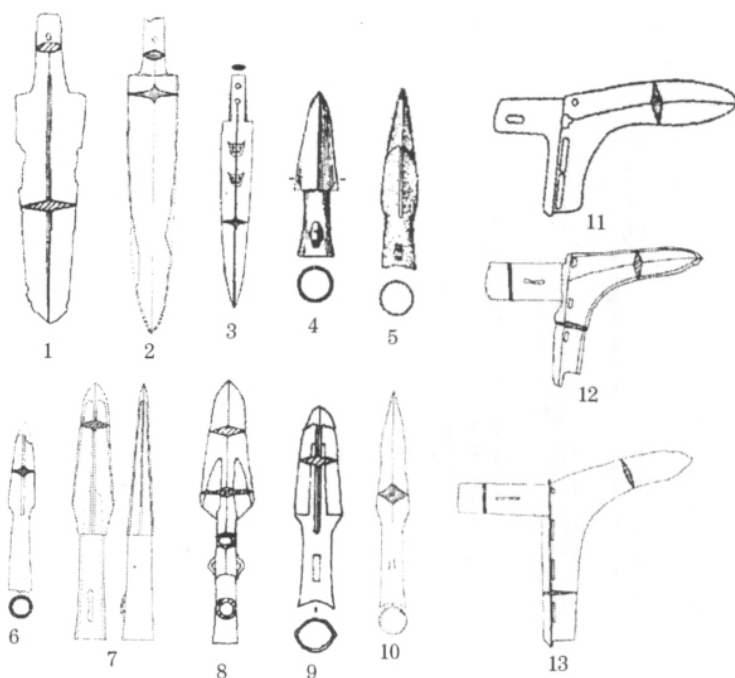
剑 喇叭形首，圆柱形茎，无箍，窄格，中脊隆起。（图七：1~6）

短剑 基本特征是扁茎无格，与越式长剑形制基本相同但较短。（图七：7~9）此类剑首先发现于西周时期的吴越地区²⁹。

钺 出土数量较多，出土时有些盛放于矢箠内，多为双翼形（图八：1~10），极个别为三翼。（图八：11）双翼形分较宽和较窄两类。双翼较宽者，脊高出本，脊侧或有血槽，斜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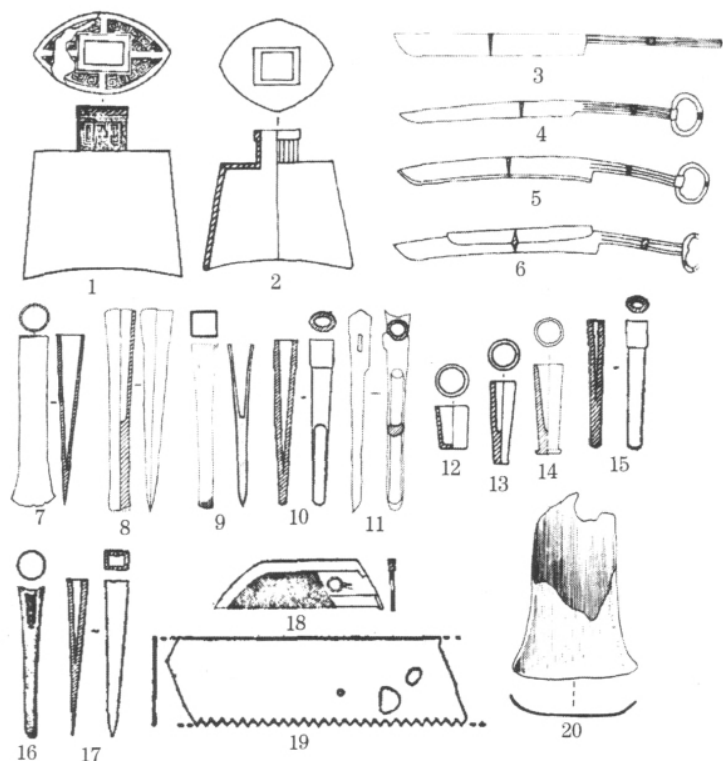
前聚成锋，后锋锐利而不出关后。双翼较窄者翼修长，中脊隆起，两脊呈坡形，中脊后伸出铤，后锋均不出关后，或有翼体两侧各有两处向内凹而形成倒刺槽口的。双翼较宽的钺是吴越地区商周时期流行的形式，后来双翼收窄，略加改进而更具杀伤力³⁰。

越式鼎 其最典型的特征是耳直立，腹部微鼓，圜底或平底，三足细瘦，足端外撇，器壁较薄。（图九）这种“三足细瘦外撇”的鼎与南方几何印纹陶的分布大体重合，因该区域也正是先秦两汉百越民族杂处之地，故被称为“越式鼎”，较早出现于西周时期长江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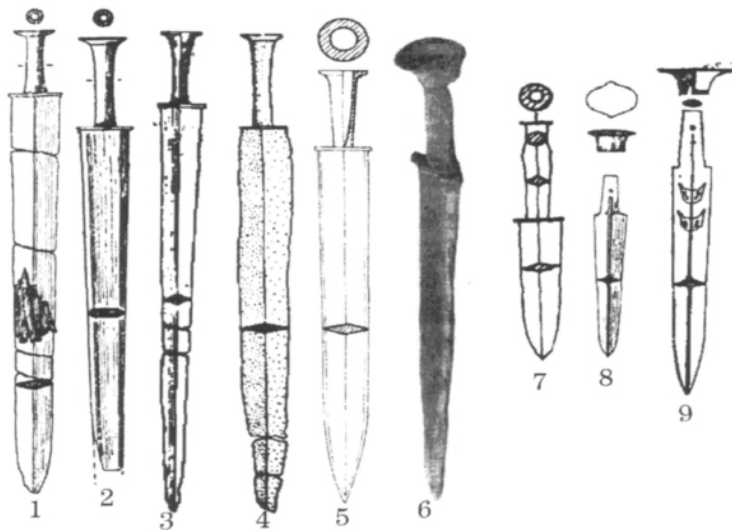
图五 兵器

- 1~2. 剑（龙嘴岗 M8） 3. 剑（利羊墩） 4. 矛（铜鼓岗 M14）
5. 矛（鸟旦山） 6. 矛（利羊墩） 7. 矛（龙嘴岗 M16）
8. 矛（龙嘴岗 M5） 9. 矛（龙嘴岗 M6） 10. 矛（龙嘴岗 M8）
11. 戈（背夫山） 12、13. 戈（龙嘴岗 M8）



图六 其他青铜器

1. 钺 (龙嘴岗 M4) 2. 钺 (乌旦山) 3~5. 削刀 (龙嘴岗 M5)
6. 削刀 (龙嘴岗 M4) 7. 凿 (龙嘴岗 M1) 8、11. 凿 (龙嘴岗 M5)
9. 凿 (铜鼓岗 M14) 10. 凿 (背夫山) 12. 镞 (龙嘴岗 M6)
13、14. 镞 (龙嘴岗 M8) 15. 镞 (背夫山) 16. 簪 (背夫山)
17. 簪 (乌旦山) 18. 镰刀 (背夫山) 19. 锯 (背夫山)
20. 锄 (铜鼓岗 M22)



图七 剑

1. 剑 (铜鼓岗 M15) 2. 剑 (铜鼓岗) 3. 剑 (怀集拦马山)
4. 剑 (乌旦山) 5. 剑 (利羊墩 M28) 6. 剑 (德庆落雁山)
7. 短剑 (龙嘴岗 M7) 8. 短剑 (铜鼓岗 M14)
9. 短剑 (背夫山)

游地区,是吴文化和越文化融合的产物,后扩散至百越各地。广东的“越式鼎”出现在春秋以后,属于典型的在中原文化影响下的百越文化系统器物^①。鼎的外部都布满烟炱,为实用器,而不具有中原地区礼器的象征意义,这也是岭南地区战国晚期墓葬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差别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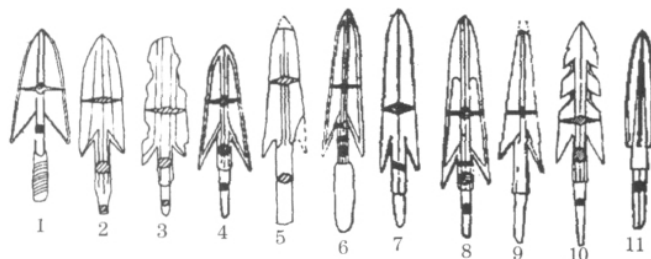
(四) 楚文化因素

楚地与岭南以五岭相隔,地缘相近,史载吴起曾“南平百越”。本区域出土的部分青铜剑和容器,与两湖地区楚墓所出器物在器形和纹饰方面风格均较为一致,应属于楚文化系统。

剑 分长短两种。茎作圆柱形,茎上有两周或三周凸起的圆箍,腊薄而窄,又称楚式剑。(图十)林寿晋将此类铜剑划为东周Ⅲ式剑^②。在中原地区从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晚期一直流行,尤以江淮流域的楚人墓葬中出土最多。

青铜容器 有鼎、鉴、盃、缶、盘等。鼎:敛口,深腹,圜底,马蹄形三足,附耳,有盖,饰带状花纹,足部有蟠螭纹,底部有烟炱痕迹。(图十一:2)鉴:直口,弧形腹,平底,或三个较矮小足,器身均饰蟠螭纹、雷纹和绹纹。(图十一:3~4)盃:直口,圆肩,圆腹,圜底,整耳,半环把,三足,有蟠螭纹、雷纹等。(图十一:1)缶:直口,圆腹,四环耳,圈足,素面无纹。(图十一:5)盘有两类,第一类为直口,平沿,直腹,口与底大小相近,两对小钮衔环耳及三个兽蹄足;第二类为弧形壁,大平底,沿外有一对小环耳,出土时相叠置于箴框内,表明是实用器物。(图十一:6~8)西周到春秋时期,中原及楚地盘与匜共同组成一套盥洗器,常相伴而出,配套使用,是楚国贵族阶层常用的洗漱用具,战国晚期逐渐减少。

圆球形器 器形似大半个圆球,



图八 铜铎

(1. 背夫山 M1 2~3. 龙嘴岗 M8

4、6~8、10、11. 背夫山 5. 龙嘴岗 M5 9. 南门洞)

顶有半环钮，钮穿圆环，器内顶部灌铅块加固，底边内收。钮周饰涡纹，主体为三组凤纹，每组两凤相对。(图十二: 2~3) 在四会县高地园山^③发现两件，浙江发现有相似的原始青瓷器，定名为权^④。据孙机考证，此类器物应该为镇，是用来压席子角的，较早于湖北曾侯乙墓有发现^⑤。

甬钟 罗定南门洞 M1 出土 6 件，身修长，

铎较尖，甬上有半环耳，六件形制和纹饰不一，推测为凑合起来的一套。(图十二: 1) 南方的甬钟由青铜铎演变而来，早期南方大铎多出自山顶、山麓或河边，可能是祭祀山川、湖泊、风雨、星辰的遗物，由商代晚期的大铎演变到西周中期的甬钟序列清楚，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商代以后，楚文化在南方继续发展，到春秋战国之时仍保持自然崇拜和祭祀的习俗，甬钟成为礼乐器物之一^⑥。南门洞出土六件类似成套的甬钟和一件铜钲，说明楚国的物质文化和礼仪习俗对岭南有较强烈的影响。

(五) 滇文化因素

不对称形钺 又称靴形钺、靴形斧等，呈靴状，椭圆釜，柄较长。(图十三) 青铜钺最早发现于中原地区高级贵族墓葬，周代继续沿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墓葬随葬青铜钺逐步减少，而西南地区东周时期钺则颇为流行^⑦，其形制也

图九 越式鼎

(1. 龙嘴岗 M17

2~3. 鸟旦山

4. 落雁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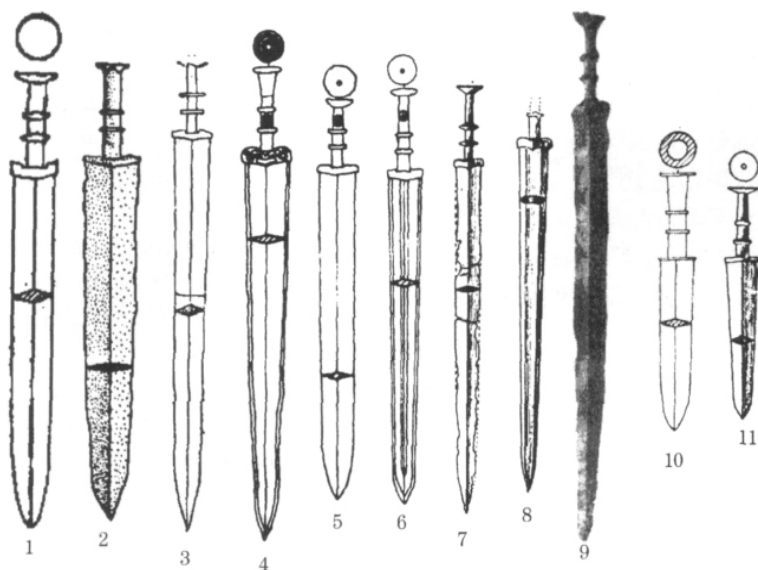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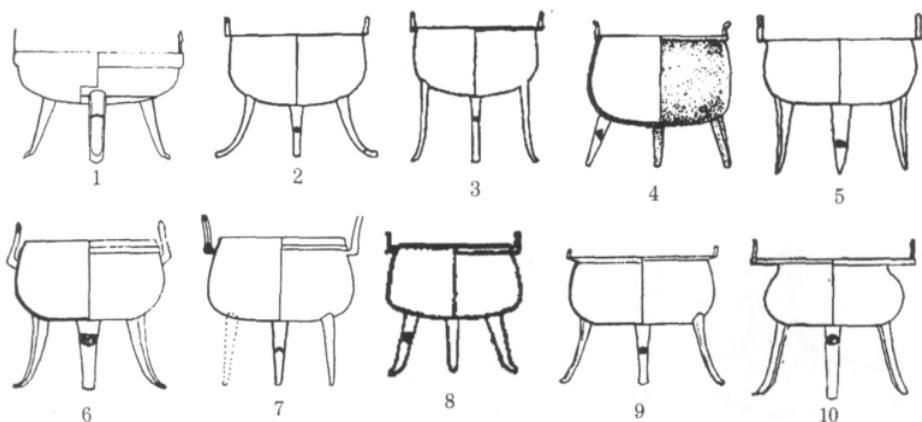
5. 龙嘴岗 M5

6. 铜鼓岗 M13

7. 龙嘴岗 M16

8、10. 背夫山

9. 铜鼓 M16)



图十 楚式剑

(1. 背夫山

2. 鸟旦山

3. 南门洞

4. 龙嘴岗 M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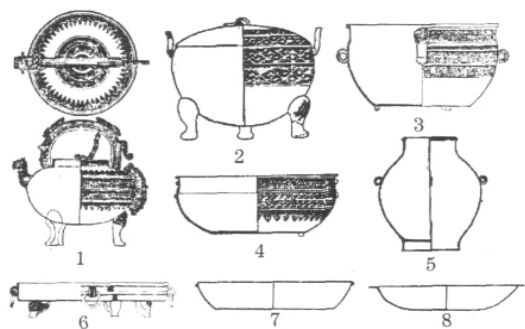
5. 龙嘴岗 M6

6. 龙嘴岗 M8

7、8、11. 铜鼓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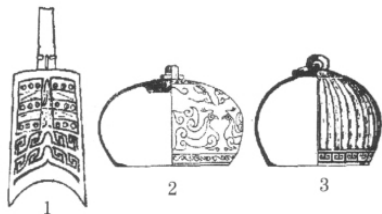
9. 落雁山

10. 龙嘴岗 M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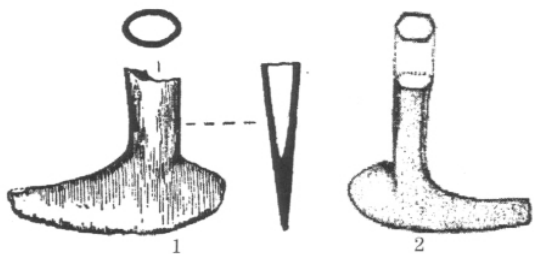
图十一 楚式青铜容器

1. 盃(南门垌) 2. 鼎(南门垌) 3. 鉴(背夫山)
4. 鉴(南门垌) 5. 缶(南门垌) 6. 盘(龙嘴岗 M8)
7. 盘(铜鼓岗 M16) 8. 盘(龙嘴岗 M13)



图十二 镇和甬钟

1. 甬钟(南门垌) 2. 镇(铜鼓岗)
3. 镇(高地园山)



图十三 不对称形钺

- (1. 铜鼓岗 2. 利羊墩)

有所改变。据汪宁生^③、范勇^④、傅聚良^⑤等人的研究,这种不对称形钺为居住在滇池周围的人制造和首先使用,战国、西汉时期逐步传播至两广和巴蜀地区,又从两广流传到湖南和东南亚的广大地区。不对称形钺与铜鼓的传播路线基本一致,两广的发现说明它们受到了西南青铜文化的影响^⑥和两地文化联系的紧密。

四、结 语

通过以上对西江流域东周时期青铜墓葬随葬品的文化因素分析,我们发现它们反映出以本地土著文化特征为主,而广泛受到了商周时期中原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地区和楚地、战国时期

西南地区影响的青铜文化面貌。墓室设腰坑并放置陶器、基底铺河卵石、随葬陶器的组合及排印方格纹和刻划水波纹等、源于本地新石器时代石铲的青铜斧钺及土著文化符号等具有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丧葬习俗和物质文化,代表了本地土著民族文化的形成,当地的土著居民应该是这些文化的主体创造者,他们就是战国秦汉时期的“南越”等土著民族。在本地土著族群发展和民族文化形成的过程中,与外地的交流和来自各地的影响持续不断,从商周时期开始,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先后通过吴越地区、两湖楚地和西南云贵地区,在当地经过发展以后揉合不同的文化因素又逐步传播渗透到岭南地区,因而西江流域青铜墓葬所反映的文化面貌十分复杂,内涵丰富而多样。外来文化在东周时期并未改变土著民族的文化面貌,先进技术和部分礼俗也逐渐被土著民族吸收利用并促使了当地社会的物质生产进步和民族文化变革,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不同地区、民族之间频繁而持久的交流,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也逐步缩小,古代文化遗存因而保留下来更多的共同性。但土著民族的长期存在并顽强延续是客观的历史,史籍中对“山越”、“俚僚”的记载,汉晋南朝以来墓葬中土著文化因素遗留就是土著族群存在和文化持久延续的表现。

- ① 广东省博物馆等 《广东德庆发现战国墓》,《文物》1973年第9期。
- ② 广东省博物馆 《广东四会鸟旦山战国墓》,《考古》1975年第2期。
- ③③何纪生 《广东发现的几座东周墓葬》,《考古》1985年第4期。
- ④ 广东省博物馆 《广东广宁县铜鼓岗战国墓》,《考古学集刊》(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 ⑤ 广东省博物馆 《广东罗定出土一批战国青铜器》,《考古》1983年第1期。
- ⑥ 广东省博物馆、罗定县文化局 《广东罗定背夫山战国墓》,《考古》1986年第3期。
- ⑦ 杨式挺等 《广东封开利羊墩墓葬群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5年第3期。
- ⑧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宁县博物馆 《广东广宁县龙嘴岗战国墓》,《考古》1998年第7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肇庆古墓》,科学出版社,2008年。
- ⑨ 肇庆市北岭松山古墓原发掘者认为时代在战国中晚期,后经黄展岳等人研究认为其时代约相当于南越

国时期前段,鉴于该墓文化特征与其他墓葬差异明显,本文未将其列为研究资料。

- ⑩ 通常认为绥江是北江支流,实际上,绥江在广东四会县以下分流为二,一入北江,一入西江。历史上对此也早有认识,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101载:“(绥江)一名滑水,又名绥建水……环绕(四会)而东,十五里至陶冶山下分为二派,一由高步出清溪入西江,一由金钗湾出南津入北江,是为三江之会。”故绥江也可作为西江的支流。本文将绥江流域的怀集烂马山、广宁铜鼓岗和龙嘴岗、四会乌旦山和高地园山等作为西江流域研究对象。
- ⑪ 郭立新 《墓葬情景分析与身份标识——以博罗横岭山墓地为例》,《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5期。
- ⑫ 蒋廷瑜 《铜柱形器推考》,《考古》1987年第8期;蒋廷瑜 《桂北南丹白裤瑶民族考古札记》,《南方文物》2008年第2期。
- ⑬ 孙淑云 《深圳大梅沙遗址出土铜器的技术研究》,《考古》1997年第7期;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 《广东深圳大梅沙遗址出土铜器的鉴定报告》,《考古》1998年第6期。
- ⑭ 杨耀林 《深圳及邻近地区先秦青铜器铸造技术的考察》,《考古》1997年第6期。
- ⑮ 李幼平 《横岭山墓地青铜甬钟音响实验与分析》,《博罗横岭山——商周时期墓地2000年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
- ⑯ 蒋廷瑜 《桂北南丹白裤瑶民族考古札记》,《南方文物》2008年第2期。
- ⑰ 黄展岳 《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 ⑱ 范勇 《再论不对称形钺》,《文物》1992年第6期。
- ⑲⑳ 覃彩銮 《两广青铜钺初论》,《文物》1992年第6期。
- ㉑ 商志耀 《三十年代香港大湾遗址考古报告的再研究——读芬戴礼〈香港南丫岛考古发现〉札记》,《香港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00年。
- ㉒⑳ 李伯谦 《中原地区东周铜剑渊源试探》,《文物》1982年第1期。
- ㉓ 沈融 《商与西周青铜矛研究》,《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
- ㉔ 李健民 《论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的青铜戈、矛及其相关问题》,《考古》2001年第5期;金则恭 《湖南东周时期铜戈的分期及有关问题》,《湖南考古辑刊》(第二辑),岳麓书社,1984年。
- ㉕ 陈振中 《我国古代的青铜削刀》,《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4期。
- ㉖ 陈振中 《先秦时代的铜凿》,《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3期。
- ㉗ 云翔 《试论中国古代的锯》(上),《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
- ㉘ 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 《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84年第3期。
- ㉙ 冯普仁 《吴国青铜兵器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
- ㉚ 叶文宪 《越式鼎溯源》,《东南文化》1988年第6期;余伟超 《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彭浩 《我国两周时期的越式鼎》,《湖南考古辑刊》(第二辑),岳麓书社,1984年。
- ㉛ 林寿晋 《东周式铜剑初论》,《考古学报》1962年第2期。
- ㉜ 沈作霖 《绍兴出土的春秋战国文物》,《考古》1979年第5期。
- ㉝ 孙机 《汉镇艺术》,《文物》1983年第6期。
- ㉞ 高至喜 《中国南方出土商周铜铙概论》,《湖南考古辑刊》(第二辑),岳麓书社,1984年。
- ㉟ 钱耀鹏 《中国古代斧钺制度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1期。
- ㊱ 汪宁生 《试论不对称形钺》,《考古》1985年第5期。
- ㊲ 范勇 《我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斧钺》,《考古学报》1989年第2期;范勇 《再论不对称形钺》,《文物》1992年第6期。
- ㊳ 傅聚良 《湖南地区的不对称形铜器》,《考古》1994年第4期。
- ㊴ 汪宁生 《试论石寨山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责任编辑:曹汉刚)